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劉玉才 主編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主編 劉玉才

編委 水上雅晴 王耐剛 馬辛民 袁媛 唐田恬
張文 張學謙
(以姓氏筆畫爲序)

總目録

第一冊

前言 1

凡例 23

十三經注疏併釋文校勘記序 27

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 29

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校勘記摠目 32

周易注疏校勘記 33

尚書注疏校勘記 269

第二冊

毛詩注疏校勘記 569

第三冊

周禮注疏校勘記 1213

第四冊

儀禮注疏校勘記 1691

第五冊

禮記注疏校勘記(上) 2309

第六冊

禮記注疏校勘記(下) 2783

第七冊

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上) 3271

第八冊

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下) 3689

第九冊

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 4131

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 4381

第十冊

論語注疏校勘記
.....
4517

孝經注疏校勘記
.....
4755

第十一冊

爾雅注疏校勘記
.....
4855

孟子注疏校勘記
.....
5221

附錄
.....
5433

前言

校勘之學是古典文獻學的基石，而對於儒家經典文本的校勘，更是經學乃至中國古典學術的核心內容。在寫本時代，校訂刊正經書文字，即已超越經師授經講學需求，而承擔起正定學術的職能。兩漢經今、古文之爭，此後刊立熹平石經、正始石經及至唐開成石經，無不致力於通過文本校訂刊正以確立權威定本。五代馮道始據唐石經刻印九經。兩宋以降，刻本漸繁，然經書文本歧異仍未消弭。儒家經典相沿有「五經」、「九經三傳」、「十三經」諸說，加之權威注釋義疏，蔚為大觀。諸經

之經注與義疏，原本別行，南宋坊刻本為便利起見，匯合經注、義疏、釋文於一書。南宋之後，十三經的組合方式，經、注、疏、釋文的文本結構，逐漸形成固定搭配，十三經注疏遂成為士人閱讀的最基本文獻，影響深遠。然而由於經疏文字率而搭配，章節分合、長短無定，而且相互遷就改易，又人為造成經典文本的混淆。宋板十三經注疏在宋元明三朝不斷刷印，但後印本多有補板、修板，字跡漫漶，明代又據之翻刻為閩本、監本、毛本諸本，文本訛誤更甚。

清康熙以降，考據之學興起，校訂經書文字漸成風尚，而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的校勘成果引進之後，亦頗為中土學人所推重。惠棟、盧文弨、浦鏜諸儒可謂開風氣之先，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等踵

武其後，至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則堪稱清儒經典校勘的集大成之作。其間，盧文弨有志遍校群經，纂爲一書，且在清儒中最先揭示「經注」、「義疏」、「釋文」原本別行，其重雕經典釋文緣起（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云：「古來所傳經典，類非一本。陸氏所見，與賈、孔所見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書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即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①盧文弨此項觀點及其校訂經書文字的實踐，頗爲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諸儒所認同與發揚。段玉裁與劉端臨第三書云：「弟意欲將三禮經注校爲定本，刊之垂後，亦不朽之盛業也。」^②王念孫、王引之的經義述聞，亦有相當部分內容屬於校訂經書文字。阮元在此學術氛圍影響之下，於嘉慶初年出任浙江學政，巡撫期間，邀集

江浙學人，編纂經籍纂詁，創建「詁經精舍」，並組織匯校十三經注疏，纂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一

關於校勘十三經注疏的緣起，阮元自謂弱冠即有此志，其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云：

臣幼被治化，肄業諸經，校理注疏，綜核經義，於諸經本之異同，見相沿之舛誤，每多訂正，尚未成書。乾隆五十六年，奉敕分校太學石經，曾以唐石經及各宋板悉心校勘，比之幼時所校，又加詳備。自後出任外省，復聚漢唐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選長

於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唐以後單疏分合之不同，明閩附音之有別，皆使異同畢錄，得失兼明，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附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③

段玉裁十三經注疏併釋文校勘記序亦云：

臣玉裁竊見臣阮元自諸生時至今校誤有年，病有明南北雖及琴川毛氏十三經注疏本紕繆百出。近年巡撫浙中，復取在館時奉敕校石經儀禮之例，衡之群經，又廣搜江東故家所儲各善本，集諸名士，授簡詰經精舍，令詳其異同，抄撮會萃之，而以官事之暇，篝燈爨燭，定其是非。復以家居，讀禮數年，卒業於鄭氏三禮。條

分縷析，犁然悉當，成此巨編。^④

但阮元校經緣起之說，并不全為後世學者所認同。清蕭穆記方植之先生臨盧抱經手校十三經注疏有云：「抱經先生校十三經注疏本，後入山東衍聖公府，又轉入揚州阮氏文選樓，阮太傅作校勘記，實以此為藍本。」^⑤蕭氏此說之根據，自謂源於方東樹臨盧文弨手校十三經注疏的校語記載。蕭文過錄了數則方東樹批校，因其中頗涉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與惠氏、盧氏原校本的關係，今彙錄於下：

此校惟論傳注同異、各本如何分別正俗得失處，至於經義之是非，與此無涉也。又見惠氏、盧氏諸家原校本，於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為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為

重，然精核可採者，亦復不少。又此記所載及惠氏、盧氏所刻古義、拾補，於此原校本詳略異同甚多，所遺亦甚多。余今以此本甄錄之，然所遺仍多，須取一善本注疏本一一傳校，一字不遺，留爲家塾讀本，亦經學一大助也。原校本三禮尤精博也。

段氏每盜惠氏之說，阮氏即載之，何也？蓋阮爲此記成，就正於段，故段多入己說，以掩前人而取名耳。又所改原文多不順適，真小人也。

今人汪紹楹根據盧文弨曾纂集周易注疏輯正、毛詩注疏校纂、尚書注疏校纂、儀禮注疏詳校，其弟子臧庸從學段玉裁，受知於阮元，參與校勘十三經注疏，而盧

文弨手校十三經注疏又歸於阮元，故斷定阮元校經，乃是受到盧文弨的啓發與影響。^⑥筆者經過文獻考察，認爲阮元延客校勘十三經注疏主要還是受到當時學術氛圍的影響，盧文弨只是啓發者之一，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與盧文弨手校十三經注疏並沒有直接繼承關係，故今存李銳周易注疏校勘記原始稿本甚至沒有直接引用盧文弨本人的校勘意見，是嚴杰補校時方與浦鏜的校勘成果一起增加進去。^⑦

二

根據張鑒雷塘庵主弟子記的記載，阮元編纂經籍纂詁始於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刊成於嘉慶四年，董其事者浙江歸安丁杰，總司校勘者江蘇武進臧庸，另有兩

浙各郡經古之士擔任具體分纂。其間，嘉慶二年還翻刊過七經孟子考文。阮元設立「十三經局」，延客校勘十三經注疏，約始於嘉慶六年。主其事者段玉裁，分任其事者有臧庸、顧廣圻、徐養原、洪震煊、嚴杰、孫同元、李銳等人。諸經校勘人情況，阮元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各序中交待如下：「元和生員李銳校易、穀梁、孟子，「德清貢生徐養原」校書、儀禮，「元和生員顧廣圻」校詩，「武進監生臧庸」校周禮、公羊、爾雅，「臨海生員洪震煊」校禮記，「錢塘監生嚴杰」校左傳、孝經，「仁和生員孫同元」校論語。實際各人參與的時間並不一致。據段玉裁嘉慶七年與劉端臨書：「雖阮公盛意，而辭不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證，^⑧自顧精力萬不能。近日亦薦顧千里、徐心田兩君而辭之。」^⑨嘉慶九年

與王懷祖書：「唯恨前此三年，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時拙作不能成矣。」^⑩據劉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譜，嘉慶八年六月，段玉裁之父卒於蘇州，很可能此後即較少參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審訂事宜。顧廣圻與徐養原一起為段玉裁延入，但因與同僚，特別是主事的段玉裁，產生學術分歧，^⑪根據其行歷，大約至遲在嘉慶八年即脫離「十三經局」。而臧庸在嘉慶七年九月完成周禮、公羊、爾雅的校勘任務後，也提前離開了「十三經局」。^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後期的補校、審訂，及至最後刊刻成書，當以嚴杰出力最多。^⑬今存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的補校部分，多為嚴杰的手跡，足見一斑。此外，徐養原或參與其事較久，因遲至嘉慶二十一年印行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進呈本，其分校儀禮注疏尚有較多

與之相關的內容增補，詳情參見儀禮注疏校勘記整理說明。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纂修流程，文獻記載無多，幸賴國家圖書館近年入藏李銳分校周易注疏校勘記的稿本和膳清本，據云得自阮氏後人家藏，可以略窺一二。李銳（一七六九—一八一七），字尚之，號四香，江蘇元和人。清乾隆末期，肄業蘇州紫陽書院，從錢大昕習算學，頗受青睞，後與焦循、談泰諸人并稱曆算名家。嘉慶初年，應阮元之聘，先是從事經籍纂詁和疇人傳的纂修編輯，隨後又參與編纂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工作，分任周易正義、春秋穀梁傳注疏及孟子注疏三書校勘之役。國家圖書館所存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經與同館藏李銳觀妙居日記原稿本比對筆跡，當屬李銳手稿。該稿本以「日增泰記」

紅格（部分綠格）紙書寫，半葉二十行，行二十三字，現存卷一至三，卷八至十一，毛裝兩冊。文本內容包括作者的原稿及修訂，兩種筆跡的朱筆校訂。第二冊卷末朱筆題署「甲子仲春三日嚴杰校補」，與稿內朱筆之一筆跡相同，故此可以判斷校訂較多的朱筆文字出自嚴杰之手。另一朱筆批校，據筆跡推測，係出自阮元之手。國家圖書館同時入藏有周易注疏校勘記膳清本全卷，紅格正楷抄寫，半葉二十行，行二十三字，毛裝三冊（卷一至三、卷四至七、卷八至十一）。文本內容有少量墨筆校改增補和朱筆審訂，推測分別為孫同元和嚴杰手跡。第一冊封底題有「約二萬乙千七百六十六／三本約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二」、「甲子十二月十七日鐙下對畢同元記」；第二冊封底題有「約二萬〇百七十」，

「甲子十二月十八日同元對畢」；第三冊封底題有「約乙万七千〇廿六」、「甲子十二月十九日同元對畢」。由此可見，膳清本是孫同元擔任復核，嚴杰最後審定，且復核的時間僅有三天。根據筆者簡單的文字比對，膳清本基本依照原稿修訂本的文字抄錄，但以旁批形式補入部分內容，阮氏文選樓刊本依照膳清本刻印，亦有少許增補。

根據周易注疏校勘記的稿本、膳清本和刻本提供的信息綜合分析，其纂刊流程可作如下推測：一、分任者李銳完成對校初稿并作自我修訂；二、嚴杰校補調整；三、阮元批校；四、膳清成稿；五、孫同元復核，并有少量增補；六、嚴杰校定（或如方東樹言，與段玉裁同校）；七、刊刻成書（刊本校樣仍有少量增補）。故諸經校勘

雖未必如阮元所云「授經分校，復加親勘」，但是校經、補校、審訂、復核，存在相對嚴格的流程，有助於提高校勘水準。此外，從稿本到刻本，文字內容甚至文本結構都有更動，而這些變化背後寓含有豐富的學術信息。

阮元於諸經校勘記均有序文，言己舊有校本，今囑某某取校各本，已復定其是非。但纂修的真實情況，恐並非如此，阮元掛名的成分更多一些，甚至各篇序文，都是他人代筆。如段玉裁嘉慶八年冬至日，撰有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云：「錢塘嚴生杰博聞強識，因授以慶元所刻淳化本并陳氏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令其精詳摭摭，觀其所聚，而於是非難定者，則予以暇日折其衷焉。」^①文字與阮元春秋左氏傳校勘記序文頗為一致，當

是段代阮捉刀。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序文，亦是原有成稿，阮元施以文字刪訂，且兩易其稿。當然，阮元畢竟是考據學大家，經學研究的造詣有目共睹，亦有相當部分成果融入校勘記之中。至於段玉裁，既然負責全書審定，自當做過不少「定其是非」的工作，至少在纂修前期是如此。周易注疏校勘記大概因成稿較晚，似未經段玉裁細加改訂。當然，段玉裁的部分校訂文字，因涉及與顧廣圻的意氣之爭，亦頗遭物議。^⑮此外，根據目前對諸經校勘記的初步整理來看，段玉裁無論校勘理念還是具體校經成果，都有滲透影響。^⑯

有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纂修經過，尚存在不少文獻缺失，學界對此亦有爭議。我們只是根據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臧清本和刻本的文本狀況，結合十三經注

疏校勘記纂修過程的文獻考察，做些初步梳理，詳情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發掘。

三

阮元廣羅善本，延納學界菁英，纂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其中備列諸本異同，廣採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和清儒校經成果，堪稱經典文本校訂的典範之作，迄今恐尚無出其右者。阮元自矜為「我大清朝之經典釋文也」，段玉裁亦謂「俾好古之士，知讀注、疏、釋文者，以是鱗次櫛比，詳勘而丹黃之，庶不為南北雝及毛本所囿，家可具宋、元本，人可由是得漢、唐本。其在我朝，校唐之陸德明釋文為無讓矣」。^⑰校勘記刊行之後，即為學界所重。焦循有評價曰：「群經之刻，譌缺不明。校以衆

本，審訂獨精。於說經者，饋以法程。」^①胡培翬撰著儀禮正義，凡涉經注校勘必引阮元校勘記，所引將近千條之多，在所據文獻中最為重要。正如日本加藤虎之亮所云：「清儒校勘之書頗多，然其惠後學，無若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凡志儒學者，無不藏十三經，讀注疏者，必并看校勘記，是學者不可一日無之書也。」^②校勘記的優長之處，約略有三：

首先是廣羅善本，備列異同。根據全書凡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以宋版十行本為主，與其他宋版諸本以及明刊注疏本（閩、監、毛）進行對校，又以經典釋文、唐宋石經以及各經注本作爲經注文字的校勘材料。此外，十三經注疏正字、七經孟子考文以及各種經解著作亦在參考文獻之列。阮校之前，無論宋儒毛居正、岳珂、

張淳校經，還是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浦鍾十三經注疏正字，不惟規模有限，參校版本亦屈指可數。而阮元藉助地位之便，又有學界菁英協力，得以博採唐石經、宋元善本、明刊舊鈔，以及當代通行本，施以詳盡對勘，備列諸本異同，在校勘規模和採納文獻數量方面，確可稱前無古人。試舉儀禮注疏校勘記爲例，其卷首引據各本目錄列有唐石經、宋嚴州單注本、翻刻宋單注本、明鍾人傑單注本、明永懷堂單注本、宋單疏本、李元陽注疏本、國子監注疏本、汲古閣注疏本、國朝重修國子監注疏本、經典釋文、儀禮識誤、儀禮集釋、儀禮經傳通解、抄本儀禮要義、儀禮圖、儀禮集說、浦鍾十三經正字內儀禮二卷、儀禮詳校、九經誤字、儀禮誤字、石經考文提要，幾乎把主要版本和前人校經成果網羅殆

盡。

其次，校勘理念先進，校勘方法全面。

山井鼎、盧文弨已經揭示「經注」、「義疏」、「釋文」原本別行的文獻實際。盧文弨批評浦鏜正字對於古書的層次構成缺乏基本區分，「其書微不足者，不盡知釋文之本與義疏之本元不相同，後人欲其畫一，多所竄改，兩失本真，此書亦未能盡正也。又未得見古本、宋本，故釋文及義疏有與今之傳注不合者往往致疑，此則外國本（指考文）甚了然也」。⁴⁰段玉裁則更進一步提出「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之說。校勘記正是遵此文獻理念，在以注校經、以疏校經注的同時，不妄改文字，充分考慮並區分文本的歷史層次。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對校諸本，不僅備列文本異文，還詳細記錄卷題

形式、提行縮格以及文字磨改、剝擠、剝改、補刊之類版刻信息，這對於我們辨析文本源流，鑒定版本，校訂經、注、疏、釋文在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譌、脫、衍、倒，都具有重要意義。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不惟校勘理念先進，校勘方法亦頗為全面。山井鼎考文多依賴對校，對於諸本皆誤的情況缺少按斷，故盧文弨十三經注疏正字跋指其雖載舊本文字，「然特就本對校而已，其誤處相同者，雖間亦獻疑，然漏者正多矣」。浦鏜正字則因所據版本無幾，故校語多「誤作」、「當作」、「疑作」之類，頗有疑所不當疑、以不誤為誤之處。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彌補了考文、正字的缺陷，其校勘方法雖仍以對校為主，但同時注重以注校經，以疏校經注，及注文前後互校，並旁取他書

引據，廣泛使用本校和他校之法。對於諸本皆誤，且無他書可證者，則引證資料或援據注疏體例，加以考訂，多有不刊之論，堪稱清儒理校成果之典範。

再次，學術考訂成果豐碩。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纂正值乾嘉學術鼎盛之時，故得以廣泛汲取匯輯漢唐古注、校訂經書文字的成果，可謂取精用弘，博考詳辨。以周禮注疏校勘記為例，總計羅列5821條校記，不僅征引歷代文獻遍及四部，還列述清儒惠士奇、惠棟、戴震、臧琳、段玉裁、孫志祖、盧文弨、程瑤田、沈彤、方苞等十餘人的考訂成果，並施以辨析取捨。^④校勘記參考清儒成果，意圖集思廣益令校勘工作更加詳備，而其間辨析取捨則不僅體現校勘者的理念，同時亦透露出清儒成果的傳播與影響幅度，可以略窺當時學界樣

貌。校勘記引述的清儒校經成果，許多並未成書流傳，故還有保存文獻之功。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分校者因學術背景、學術功力有別，呈現水準不無參差，但大致都以訂正文字為旨歸。其中如成就較為突出的毛詩注疏校勘記，在例行的版本比勘、引證他書材料之外，還善於發現材料之間的關聯，綜合運用各類文獻，進行文本校勘。顧廣圻憑藉出色的文獻功力，考辨異文來源，不僅判斷是非，更力求還原不同時代的文本，達至考鏡源流之功，同時還注意歸納通例，以揭示古典文獻、古代漢語中具有普遍性的規律。因此，毛詩注疏校勘記就不只是羅列異文、排比材料的簡單校語集合，而是一部考證精詳、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考據學著作。

當然，誠如前賢批評，十三經注疏校